

08
黑龙江青运史资料丛书之一

忆往昔

YI WANG XI



黑龙江省青运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共青团 黑龙江省委 青运史 研究室

黑龙江青运史参考资料丛书之一

忆 往 昔

黑龙江省青运史办公室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青运史研究室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史志
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	赵文洲	
副主任	王欣际	姜 明
	霍凤鸣	
委 员	迟春田	刘亚文
	李兰田	于国政
	王雅军	侯如意
	杨同芬	

编 者 的 话

我们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将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和访问谈话记录奉献给广大青年工作者、史志工作者和从事青运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

忆往昔，岁月峥嵘。

在旧中国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他们出生入死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发动和引导最先觉悟起来的部分青年，按照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给共和国的旗帜染上了光辉的丰彩。我们感到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经历，不仅是研究历史时的珍贵资料，而且也是亿万青年们的可贵的精神食粮。

愿我们所有展卷者，都能从中吸取到所需营养，从而净化我们的灵魂，陶冶我们的情操，激励我们的斗志，学习他们的榜样，为中华的腾飞去奉献、去拼搏。

忆 往 昔

李范五：我的青年时代	(1)
于开泉：往事漫忆	(14)
韩光同志的回忆：	(25)
王鹤寿同志的回忆：	(32)
何能同志的回忆：	(38)
何能：关于满洲省委遭受破坏的情况	(44)
陈雷：党是革命引路人	(50)
赵翟华：“五·四”运动在哈尔滨	(57)
张洛华：哈一中的学生运动	(61)
集体回忆：共青团哈市二中师范支部创立及活动	(68)
潘连三同志的回忆：	(78)
高成儒同志的回忆：	(81)
赵洵同志的回忆：	(86)
程尔康同志的回忆：	(88)
王景侠同志的回忆：	(92)
郭戈一同志的回忆：	(102)
朱新阳同志的回忆：	(106)
钟子云同志的回忆：	(118)
任震英同志的回忆：	(121)
于苏同志的回忆：	(126)
王效明同志的回忆：	(130)
黄铁城同志的回忆：	(135)
杨光华同志的回忆：	(139)
冯永荧同志的回忆：	(144)
薛文同志的回忆：	(149)
赵三声：回忆宾县共青团特别支部	(152)

我的青年时代

李范五

我今年七十二岁，已经是年愈花甲了。但是，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已逝的青春岁月，那难忘的战斗生活，常常萦回在我的脑际，使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童年的反抗

我家原籍在辽宁省辽阳县农村。家中一无土地，二无牲口，一贫如洗，无法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谋生，我的祖父把我的一个姑姑卖了，然后，全家就用姑姑的卖身钱做路费，一路挑着担子，走到了牡丹江地区的穆棱县。当时的北大荒，人稀地广，祖父就在这儿落户了，又用剩下的路费买了一片荒地。从此，一家男女每天起早贪黑地干，用锹挖，用镢头刨，把荒地一点点地开垦起来，吃饭的问题就逐渐解决了。这时我家给辽宁的亲友回信说，这里土地又肥又多，生活好过。这些穷亲友们接到信，就先后投奔我家来了。我的祖父让亲友们来开垦我家所买的荒地，约定三年内不拿租，三年后，一垧地拿一担租。亲友们借用我家的牲口、农具，以至于借粮、借钱，都要收取一定的利息。虽然数量不大，但性质是剥削。这样，我家就靠自己一家男女的劳动和收取穷亲友们交付的利息，一点点地富起来了。

一九一二年，我就在这样一个北大荒式的富农家庭里出生了。当我六、七岁时，家里的土地已增加到一百垧（一百公顷）了，发展为经营地主。后来，由于闹土匪，把我家里的房子烧掉了，乡下呆不下去，我家就在穆棱城里买了一号街基，盖了十三间房，在那里住下了。从此，放弃了土地经营，完全靠拿地租生活了。

我生长在农村，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干零活，放猪、捞鱼、打野鸡……，由于我与穷亲友们经常接触，使我从小就产生了一种不自觉的正义感。同时，对我的剥削家庭也产生了某些不满情绪。还在童年时代，我就怀着对穷亲友们的同情，有时在威严的祖父面前替他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

我有一个魏二大爷，家里特别穷，一家大小没吃没穿。东北人的习惯是过年要杀年猪的，可是，他家连一口大一点的年猪都喂不起，只好喂一个小的。因为他欠了我家的钱还不起，我祖父就不顾亲戚情份，狠心把他家的小猪赶来抵债。我知道后，有些气愤，就不顾一切地和祖父争辩起来：

“咱家过年要杀两口大肥猪，人家就那么一头小猪，你都不留给人家吃口肉，还都是亲戚，太不够意思了！”祖父说：

“他欠我钱，我要钱有什么不对？”我说：“所有的人过年都要吃肉，你不让人家吃肉，能过意得去吗？”祖父听我这样一闹，也觉得理亏，虽然没把猪送回去，但把我家杀的猪送给了他们一块肉。

我有一个舅舅，家里也穷得厉害，过年时，连顿白面饺子都吃不上，只能吃荞麦面的素馅饺子。他家有后沟买了四、五垧地，后来，由于欠我家的债还不起，祖父就把他家的地收来了。我那时很小，还讲不出更多的道理，可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就不平地同祖父又争辩了：“我舅舅和姥

她家连吃穿都没有，你又把地弄来了，让人家怎么过日子？”

在家里有时我是个不服从者，在学校里我也不那么驯服。在私塾上学时，我学习成绩很好，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第一”。有一次，我又考了第一，私塾老师为了讨好学东，到发榜时，就把学东的儿子列为第一，而把我排在第二名。我看了榜，心里气极了，就以儿童那种幼稚的形式开始了反抗。当时，私塾里的规矩是，老师号完了一背书，学生就要把课文背下来。从成绩榜一公布，我就不肯背书了，进行“个人罢课”。老师看我不背书，心里也明白是什么原因。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老师让我背书，我还是不肯，老师严厉地说：“你因为什么不肯？”我说：“你自己知道！”。老师恼羞成怒，就拿起戒尺打我的手板。我又吵又闹不屈服，老师又换了个大戒尺打我的屁股。我还是不屈服，一气之下，收拾收拾书包就跑回家去了。私塾老师和我家有亲戚，后来，又让他的母亲来说情，说打了就算了，让我仍回私塾上学。我坚决不去，家里也没办法，只好允许我到街里的小学校去读书。

初小毕业后，由于祖父思想保守，认为孩子喝几年墨水，能写信、写对子就够用了，又怕我多花钱，就不想让我再升学了。可是，我是多么想继续上学求知啊。祖父那样顽固，咋办呢？我想起宁安县有我过去的一位老师，可到他那里念书，于是，我就偷偷地把祖父藏的钱拿出来一些，坐火车到宁安去了。这时，我才十四、五岁，家里找不到我，都急坏了，哭哭啼啼地闹了一天。他们偶然碰到了宁安老师给我写的信，猜想我可能是去宁安了，就打发人到宁安找到了我，说：“祖母想你都想病了，你快回去吧！”我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很爱我的祖母，就被家里人骗回来了。这

时，祖父的态度也好多了，他说：“你要念书就念吧，但最好是在本地念，不要到外地去”。这样，我的反抗取得胜利，我终于争得了继续上学求知的权力。

我在家乡附近的穆棱站东铁第十三校学习了一年半，由于学习成绩好，就提前半年在高小毕业了。一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了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

参加“一一·九”运动

一九二八年冬天，日本要在东北筑吉会路（吉林到朝鲜会宁）的消息传来了，在学校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学们都纷纷地议论着，决不能让日本到中国来修铁路，一定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当时，我虽然年纪还很小，不懂得更多的道理，但出于爱国热情，在高年级同学的带动下，也参加了“一一·九”运动。

“一一·九”运动中，一中是出面进行组织领导工作的主角。学生领导人是沈步瀛等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后来听说，沈步瀛当时不是党、团员，只能算作一个爱国学生）。那时，学校成立了学生会，沈步瀛是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经过一番酝酿，又串联了二中、三中、女子第一中学、吉林省立六中、扶轮学校、许公学校、医专、哈工大、法政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会，共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十一月九日这一天，学生们首先在道外八区贮木场的一片荒地上集合好队伍，然后去道外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道外西门脸（道外正阳街头），遇到滨江县武装警察阻拦，不让学生前进。学生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们还是不让过。后来，大家一齐喊起来：“闯过去”！学生们就不顾一切地往前冲。这时，警察向空中鸣枪了。枪声一响，队伍就乱

了，人们跑的跑，挤的挤，有的被撞伤了，有的被踩坏了，受伤的很多。特别是医专的女同学，受伤的更多。警察开枪后，东省特别区长官张焕相立即派三汽车警察到现场来，把滨江警察吓跑，学生队伍就进入正阳街游行示威。当时，哈尔滨是三权鼎立，道里、南岗、马家沟属东省特别区管辖；道外属吉林省龙江县管辖；江北马家船口归老黑龙江省管辖，这三个政权之间是有矛盾的。张焕相想利用学生运动整垮滨江县政府，所以，他调来了三汽车警察给学生助威。学生们到了道外滨江县政府，然后转回道里到道尹公署。这些官府的人都跑光了，学生们扑了空。这时，天也晚了，队伍就解散了。

“一·一·九”运动是我最早参加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一斗争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在我的心中点燃了爱国的火焰，后来听说，这次斗争是我党领导的。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志到黑龙江视察林区时，曾经问我：“你在哈尔滨哪个学校读书？”我说：“在一中，当时参加了学生反日请愿运动”。少奇同志说，那个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当时为什么要组织反日活动呢？就是因为国民党唆使反动军阀反对苏联，他们提出了“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制造中东路事件，驱逐了苏联驻中国领事。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盲目地跟着他们跑。敌人搞反苏运动，我们就要积极地把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引向反日，所以，中共满洲省委就组织和领导了“一·一·九”运动。我问少奇同志：“你在哈尔滨时，住在哪儿？”他说：“我二九年到哈尔滨，是住在道里一个中学教员的家里，具体地点我弄不清了。这个教员的老婆是个日本人。我们在他家里开会，研究反日的事，他的日本老婆就给我们站岗。”后来，我请杨左青同志查一下，这个教

员是谁，还在不在。杨左青同志查了一阵，说有一个教员叫林大皮鞋的，他的老婆是个日本人，曾经住在道里买卖街那一带，后来下落不明。

“九·一八”后的苦闷与追求

一九二九年春天，听说北平俄文法政学院招收插班生，同班同学揶揄我一起去北平，这样，我就进入北平俄文法政学院预科一年级读书。一九三一年春，俄文法政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商学院，把原来开设的政治、经济、法律三个系，改为外交领事系、殖边系和运输系。我入了外交领事系。当时，我还是个死读书的学生，为了学好俄文，就把俄文单词写成字诀，反复背诵，加深记忆，还常常去俄文教员家里去补习功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蒋介石反动政府采取了不出兵、不抵抗的政策。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我们自然不能在学校里继续读死书了。

事变发生后，北平各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去张学良的行轅静坐，要求张学良出兵抗日，结果毫无作用。紧接着，各学校学生又开始组织南下，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当时，一听说要南下，同学们心都很齐，有的把衣物卖掉，有的借了点钱，就准备出发了。十二月四日上午，北大、法大、农大、辅大、女大、铁路学院等二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大约有两千多人，在北平前门车站集合了。我们俄文法商学院的学生也去了，领导人是毛凤阁（他是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当时无党派，只是一个爱国学生）。学生们一致要求挂车去南京，国民党市党部不让去，学生们就卧轨静坐，一直斗了三天，致使铁路交通阻塞。到七日上午，国民党才

不得不答应给学生们的挂车。当时，本来有五、六千名学生要南下，可是，由于国民党派兵阻挠，只有三千多学生上了车。车开到天津、济南，又陆续上来一些学生。车开到蚌埠，国民党政府派人送来了大桶饼干，假心假意地向学生们表示“慰问”，并劝说学生回去。同学们义正辞严地质问他们：“国民党为什么不出兵抗日？我们到南京去，是代表全国人民提出要求的，是爱国的正义行为，为什么叫我们回去？”他们被问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在北平车站集合时，本来是到南京示威。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开车后就分化为示威团和请愿团。我们俄文法商学院带队的是个无党派、胆子小的人，所以，领着我们参加了请愿团。十一日，我们到了南京，分别住在各大专院校。我们学校的同学都住在金陵大学的大礼堂里，睡在凳子上，吃的是南方的大米饭，很硬，北方人都吃不惯，可是，没有一个同学叫苦。十二日，大家休息。十三日早晨，同学们就列队到国民政府请愿去了。进了国民政府的院子，四周早有军队警戒森严。学生代表提出要见蒋介石，蒋介石没出来，先派教育部长蔡元培出来讲话。蔡元培没说几句，就被学生们哄下去了。大家一致喊着，让蒋介石出来。过了有半个小时，蒋介石才慢慢腾腾地出来了。他搓着鹰勾鼻子，扯着嗓门喊了一阵，无非是什么学生要好好念书，增长知识增强本事，才能救国，等等。最后，他说：“出兵很容易，只要我签下‘蒋中正’三个字就行了，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办，至于什么原因，二十年后你们就知道了。……”他放完了狗屁就溜走了。请愿毫无结果，同学们又失望又气愤，大家又在那里喊了一阵反对国民党不出兵抗日的口号，才走出大门。我们在南京呆了两天，十五日返回北平。

后来知道示威团到南京没有马上行动，他们等上海、武汉等地学生到后搞总示威。大约是十五日，示威团才开始行动，去国民政府质问。蒋介石不出来，只有蔡元培出来。学生们又去中央党部，又是蔡元培出来，大家向蔡元培起哄要求蒋介石出来，警察就向学生动起武来，学生被打死打伤很多。在混乱中，有些学生把蔡元培抓起来，架到郊区，打算用他做人质，强迫国民党放回被捕学生。结果，由于学生们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蔡元培又被国民党军队抢回去了。十七日，上海、武汉、安徽、广东等地学生到了，开始了总示威。去中央党部时路过《中央日报》社，学生把报社砸了，警察开枪打死打伤好多学生。十八日晨，军队把学校包围，强迫学生上火车返回原地。

面对“九·一八”以后黑暗的社会现实，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思想充满着苦闷。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感到厌恶、憎恨，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了忧虑。我也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着，在苦闷中追求着，希望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

这时，通过同班同学李荫永介绍，我先后阅读了《唯物史观》、《辩证法》和瞿秋白的《中国往哪里去？》这三本书，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启迪。我开始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李荫永同学看我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就有意识地吸收我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记得，那是一九三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几天，李荫永同学说：“为了纪念红五月，听说要搞游行示威活动。‘五·一’那天去的人一定很多，咱们也去看看好不好？”我高兴地说：“去吧”。到了“五·一”这一天，我

们很早就去了，地点是在天桥。当时的天桥人很乱，很杂，卖艺的，耍猴的，说大鼓书的，卖衣服的、开饭馆的、摆杂货摊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时，一些男女学生仨一帮俩一伙，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走来了。开始，大家都装作没事，随便蹓跶，看这看那。游行时间一到，就有人放起了鞭炮。鞭炮一响，男女同学们马上胳膊挎胳膊，四人一行，依次排成长长的队列，就向城里进发了。队伍两侧有身强力壮、会武术的纠察队员保护着，骑自行车的同学来往穿行，在同学中传递着消息。这时，一些便衣特务也赶来监视学生，但由于他们人少，没敢动手。我们的游行队伍从天桥出来，就经过花市大街进入崇文门，准备向东单前进。队伍还没到东单，大批武装警察就来堵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学生们冲过去，和警察展开了搏斗。警察开枪了，有的同学被打伤，有的被捕，也有的被追赶，队伍被冲散了。

游行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和李荫永同学商量：“要走革命这条路，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咱们一起去找共产党行不行？”李荫永说：“即使咱们能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也行啊”。他还说：“你明天就找，找到了咱们一起加入”。隔了一天，五月三日，我校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负责人就找我谈了话。这个人叫于志洛，是我校高年级的一个同学。他向我介绍了反帝大同盟组织的性质、目标和任务，我坚决地表示同意反帝大同盟的纲领。于志洛同学说：“今天你就正式成为反帝大同盟的盟员了，李荫永是你的介绍人。”我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从于志洛的屋子一出来，我就给了李荫永一锤子：“原来你早就参加反帝大同盟了”。说完，我俩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在斗争中成长

参加反帝大同盟，使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更多的革命工作和斗争，并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在反帝大同盟里，我主要参加了以下这些活动：

一、组织起来，开展对敌斗争。当时的主要形式是举行示威游行。

一九三二年，纪念“五卅”那一天，学生们在天桥集合，准备经前门向城内进发，举行示威游行活动。队伍行至金鱼胡同，学生都被挤在狭窄地带，警特趁机用卡车冲散队伍，并跳下车大肆抓人，逮捕了许多学生。

这年十一月间，学生们又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院内集合，准备去检查日货。警特堵住大门不准学生出去，于是发生了搏斗。同学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前线”从墙内向外面的警特扔石头；另一部分同学在后方拾运“武器”。经过一阵紧张的战斗，学生们开始向外冲。警特用压水机向学生身上喷水，同学们不顾一切顶着射水冲出包围，但由于大街上站满了警特，到处抓人，学生无法集合，就被冲散了。

也是这年十一月份，同学们还占领了北平市政府。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第一院给在北平的东北学生发生活救济费，每人发五元，这也是经过学生斗争才得来的。可是，发钱后大家一想，这够几天吃的，还得同他们斗。于是，学生们嚷起来：“走！找市政府算帐去！”就列队向府右街市政府（即现在国务院所在地）进发。这是个星期天，市政府无人办公，学生们冲进去，占领了各办公室，把市政府要处理的文件都批上了“照准”两字，并打开厨房自己做饭。这时，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同志提

出，要坚持“占领”下去，明天不让他们上班，我们要求长期发生活费。于是，大家就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到了晚上，警察局来人，叫学生撤出去，出去一个人，到大门口给一元钱。同学们说：“一元钱好半个屁！不答应我们的要求，绝不撤走。”到夜间，一队队警察开来了，站在院里。学生们向他们宣传：“东北学生国破家亡，生活无着，市政府非给生活费不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齐心对外打日本！……”同学们说得声泪俱下，很多警察被感动了，默不作声，悉心倾听，还有的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半夜十一点左右，警官下令向学生动手了。警察们冲进屋里，用皮带抽，用枪托打，学生们进行反击，打碎玻璃，推翻花盆，砸破卷柜，有的会拳术的同学打坏了警察的下巴。这时，警察还站在每个门口的两侧，赶出去一个打一个，把学生打出去了。

通过参加这些对敌斗争，同敌人进行一次次搏斗和较量，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反共反人民的丑恶面目，同时，也进一步磨炼了我的斗争意志。

二、运用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比如：

举办平民学校。把那些上不起学的贫苦人家的子女组织起来，进行学习。我们在平民学校里当先生，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文化知识，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还认真地为他们批改作业。通过这种形式，为党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

开展宣讲活动。当时，学生们经常到各工厂、农村进行宣讲。记得有一次，我们事先了解到，有一个骆驼队要从北平城出发去门头沟煤矿驮煤，我们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向骆驼队讲演。我这次主要担任保卫工作。这时正值六、七月份，青纱帐已经长起来了。骆驼队的人骑着骆驼，我们十

几个学生就跟着他们走，边走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快被城里的特务知道了消息，就骑着自行车赶来抓人。同学们看特务来了，都机警地钻进庄稼地里，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参加粉笔队。同学们为了宣传抗日，组织起了粉笔队，在各个街道分片包干，书写宣传口号。到了晚上，我们就拿了粉笔，仨一帮，俩一伙进行活动。有的担任警戒，有的进行书写，看到敌人来了，我们就发出暗号，迅速逃走。第二天早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警察发现了，就一条一条地擦。到了晚上，我们再写。就这样，敌人天天擦，我们天天写，搞得敌人不得安宁，群众看了都暗暗高兴。

举行飞行集会。我曾经参加过三次，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鼓楼市场搞的飞行集会。当时，我们有三、五个人，事先找好了地方，然后就突然鼓起掌来，引起了群众注意，大家都来围观。这时，演讲的同学往高处一站，就讲一通抗日救国的道理，只三、五分钟，很简短，敌人还来不及抓人，我们就已经跑散了。

与此同时，我还担任了反帝大同盟的秘密交通工作。那是一九三二年八月间，组织通知我担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书记处总交通员，和我直接联系的是秘书长安仲更（他当时是北大三院的一个学生）。安仲更交给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个皮包，给我的任务是定期把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的文件和宣传品送到下面各个点去。我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就先练骑自行车，把自行车练得倍熟。同时，把我应走的路线，大街小巷，各个胡同都熟记在心。这样，每次取送材料，道路不重复，让敌人摸不到规律，所以，我每次都顺利地完